

《梅溪词》四论

雷履平

一 史达祖其人

南宋史达祖的《梅溪词》，当时评价很高。张铉认为：“可以分镞清真，平睨方回，而纷纷三变行辈，几不足比数”（《梅溪词序》）。姜夔也称许他的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引姜夔《梅溪词序》）。陈造甚至认为，史梅溪与高竹屋的作品，“皆周、秦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若唐诸公亦未及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引）。稍后，张炎在《词源》一书中，把他和北宋秦观、南宋高观国、姜夔、吴文英并举，说：“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又盛赞他的咏物和节序词。张炎的学生陆辅之在《词旨》中也说：“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是四家的长处。

为什么与周、姜、梦窗齐名甚至被誉为超过唐代词人和北宋秦观、周邦彦的梅溪词，却得不到后代的肯定呢？原因之一，据说在于他的“人品”。

王士禛《跋史邦卿词》（《蚕尾集》卷八）写道：

史达祖邦卿，南宋后词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韩侂胄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弹任胄疏》云：苏师旦即逐之后，堂吏史达祖、耿怪、董如璧三名随用事，言无不从，公受贿赂，共为奸利。叶绍翁记苏师旦、周均等本末云：师旦即逐，韩为平章，专倚省史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

侍从束札，至用申呈。有李其姓者，尝与史游，于史几上大书曰：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未几致黜云。其人品流，又远在康与之下，今人但知其词之工尔。

王氏所引雷孝友疏，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僚雷孝友上言》。孝友，字季仲，开禧元年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见陈騏《南宋馆阁续录》；所引《任胄、师旦、周均等本末》，亦见《四朝闻见录》戊集。叶绍翁还说：就在雷孝友上疏之后，开禧三年十一月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史达祖、耿怪、董如璧并送大理寺根究。史达祖被判处黥刑，就是大理寺的裁决。这位才人的遭遇是很不幸的。王氏说：“其人品流，在康与之下。”康与之依附秦桧，是十狎客之一。用秦桧比韩侂胄，用康与之比史达祖，却是极不公正的。

张宗楠《词林纪事》引楼敬思云：

史达祖南渡名士，不得进士出身，以彼文采，岂无论荐？乃甘作权相堂吏，至被弹章，不亦降志辱身之至耶！读其《书怀·满江红》词：“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又读其《出京·满江红》词：“更无人摩笛傍官墙，苔花碧。”“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亦善于解嘲者矣。然集中又有《留别社友·龙吟曲》：“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阍干静，慵登眺。”新亭之泣，未必不胜于兰亭之集也。乃以词客终其身，史臣亦不屑道其姓氏，科目之困人如此，不禁三叹。

楼敬思，名俨，号西浦，清浙江义乌人。“其学于词最深，自宋以下词家，原委派别，求其指归”（《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楼俨肯定了史达祖的爱国感情，举目有山河之

异的新亭之泣，比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的兰亭修禊是有差别的，故在留别词社友中流露出来。他把史达祖的降志辱身，归之于科目困人，远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云：“史邦卿奇秀清逸，为词中俊品。张功甫序其集而行之，乃甘作权相堂吏，身败名裂，卒与耿怪、董如璧辈并送大理，何其悖也。”他慨叹史达祖不能象程有徽那样不顾韩任胄的拉拢，拂袖而归，认为，“邦卿顾不出此，而为苏师旦之续，至使擢华高手，姓氏不见录于《文苑》中。其才虽佳，其人无足称已。楼敬思俨科目困人之语，非持平之论”（陈廷绅《白雨斋词话》卷五也有同样看法）。由于受传统的影响，对史达祖的附韩缺乏正确的认识。

号称“桂派先河”的清末词坛巨匠王鹏运甚至在《四印斋所刻词》的《梅溪词跋》中怀疑词人史达祖与任胄堂吏史达祖不是同一人。《跋》云：

右史邦卿《梅溪词》一卷，陈氏《书录解题》云，汴人史达祖邦卿撰，张约斋铤为作序，不详何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韩任胄为平章，专倚省吏史达祖，韩败黜焉。”或遂谓邦卿即任胄吏，并引词中陪节北行“一钱不值”等语实之。按陈氏去任胄未远，邦卿果为其省吏，何必曲为之讳，猥云不详？即以词论，如《满江红》之“好领青衫”，《齐天乐》之“郎潜白发”，皆非胄吏所能假托。且约斋为手刃任胄之人，何至与其吏唱酬，复作序。颠倒如此，殆不然矣。堂吏非舆台；任胄之奸，视秦、贾有间。邦卿真为省掾，原不必深论。特古今同时同姓氏者，正自不乏，强为牵合，亦知人论世者所宜辨也。

《跋》中提出的疑点凡三：一是陈振孙生活的时代离韩任胄不远，不应不知史达祖；二是就词论词，不是一个胄吏的口吻；三是张铤参预诛韩，不可能和他的胄吏往还。其实，这些怀疑，都缺乏事实根据。王鹏运自己说得好：堂吏不是舆台，韩任胄不是秦桧、贾似道一流。他认为“不必深论”的，却接近于事实。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直斋书录解题》条考陈振孙于淳熙四年（1177）官国子司业，端平三年（1236）知台州（陆心源·丁宝书《湖州府志·人物·陈振孙传》作端平四年，所据皆《会稽续志》），嘉熙元年（1237）知嘉兴府。陈振孙虽与韩任胄生活年代相近，但不在临安，不一定知道他的区区省吏。张铤则与韩府有通家之好，史弥远接受张铤建议欲杀韩任胄，还得利用张铤与韩的关系，借韩爱姬三夫人号满头花的生辰，移庖任胄府，酣饮达旦，致使任胄大醉，烧去了周筠的告变帖子（周密《齐东野语》卷三《诛韩始末》）。《四库总目·梅溪词提要》举集中的北行词五首，说：“核其词意，必李壁使金之时，任胄遣之随行觐国，故有诸词。知撰此集者，即任胄所用之史达祖。”又谓：“考玉津园事，张铤虽预其谋，而铤实任胄之狎客。”“此编前有铤序，足证其为任胄党。序末称‘数路得人，恐不特寻美于汉’，亦足证其实为掾吏，确非两人。”史非一般胄吏，两人往还，无可置疑。张铤醉心禄位，自以诛韩有功，赏不满意，又想用同一手腕去掉史弥远，结果事败被谪死去。（《齐东野语》卷十二《张功甫豪侈》）。这样的人是不会顾虑与胄吏往还有沾他王孙身分的。至于王氏所举“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郎潜几缕，渐疏了铜驼，俊游俦侣”词句，不但不能证成其说，反而说明史达祖的“省吏”身分。

《梅溪词》中有《夜合花·赋笛》一阙，写得低徊凄婉，十分沉痛。它的下半阙云：“当时低度西邻。天淡阑干欲暮，曾赋高情。子期老矣，不堪带酒重听。纤手静，七星明。有新声应更魂惊。梦回人世，寥寥夜月，空照天津”。词人用向子期听邻人吹笛怀念被害好友嵇康、吕安的故事想说明什么呢？嵇康因为“与魏宗室婚”的关系，无辜地和吕安一道被司马昭杀害了。他们的好

友向秀在《思旧赋序》中写道：“予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逝，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赋中又说：“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佇驾言之将迈兮，故援翰而写心”。在当时残酷的政治环境里，向秀既没有对这场政治迫害表白自己看法的自由，又没有一掬同情之泪放声一哭的权利，只能提提过去聚首的情谊，用寥寥几行悼辞弯弯曲曲地写心了。词人哪里是单纯用笛的典故，而是以垂暮之年经过被害故交的旧庐，借这个故实传达难以言传的内心痛苦。我曾怀疑这是词人“老矣”悼念韩任胄的词，韩任胄这位“志远而疏”的外戚与嵇康身世多么类似啊！一结更借李谔天津桥上闻笛故事点明时移世易、欲哭无泪的哀愁。元稹《连昌宫词》：“李谔攀笛傍官墙，偷得新翻数般曲。”元自注云：“玄宗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诘验之。自云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官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谔也。玄宗异而遣之。”很显然，这里写的是政局变化以后的沧桑之感和身世之痛。集中另有《满江红·中秋夜潮》一阙，同样是郁勃烦冤，宣泄了难言之隐。全词托潮抒情，哀悼忠良的冤死。《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载吴王夫差冤杀了功臣伍子胥，子胥的尸体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又《勾践伐吴外传》载越王勾践杀了功臣文种，一年以后，伍子胥的英灵从海上穿山把文种挟持了去，变为潮神。潮头潘侯，子胥

所化；潮尾重水，文种所化。词的上半阙说：“想子胥今夜见嫦娥，沉冤雪。”下半阙说：“激气已能消粉黛，举杯便可吞吴越。”一则希望子胥、文种之灵能使沉醉在粉黛之中的统治者清醒；二则慨叹忠良被害，自毁长城，国事遂不堪问。范成大《题夫差庙》诗云：“千龄只有忠臣恨，化作涛江雪浪堆。”估计是悼念虞允文的。梅溪则借潮以悼韩任胄。所以下面接着写道：“待明朝说似与儿曹，心应折。”“心折骨惊”，本江淹《别赋》中语，用来说明自己的苦痛心情并让儿辈记取这一血的教训。这恐怕是韩任胄被害之后，投降派气焰嚣张之际为韩翻案的第一首词。这与陆游为韩任胄翻案的诗“上蔡牵黄犬，丹徒作布衣，苦言谁解听？临祸始知非”（《书文稿后》）有异曲同工之妙。陆游以李斯相秦的功勋，刘毅剪除桓玄的业绩，结果不免诛戮来哀悼韩任胄，史达祖则以子胥、文种寄慨，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史达祖的身分么？

史达祖为什么要依附韩任胄？这使我们联想起爱国词人辛弃疾和上面提到的爱国诗人陆游与韩任胄的关系。辛弃疾对韩任胄的称赞是：“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六州歌头》）。从韩厥的保存赵氏孤儿到韩琦的定策立宋英宗和神宗，谈到韩琦曾孙韩任胄为了一洗靖康之耻、重整乾坤的锐意北伐。由衷的称赞，产生于“整乾坤”这一共同信念。陆游《韩太傅生日》一诗，一则说，“天为明时生帝傅”，再则说，“问今何人致太平？绵地万里皆春耕，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同样是把韩任胄当作主战派领袖看的。韩任胄前后执政十三年，追封爱国将领岳飞为鄂王，削去卖国贼秦桧的王爵，发动收复金人占领区的北伐战争，这些政策措施是大得人心的。终因北伐准备的不足，信任的非人，在投降派的暗害下，以致有玉津园

之变，但不能因北伐失败连主战的历史功勋也加以否定。只要看看金国谥之为忠缪侯，称其“忠于为国，缪于为身”（《四朝闻见录》乙集，《齐东野语》卷三，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的事实，这个问题也就易于理解了。《宋史》列秦桧、韩侂胄入《奸臣传》，明代诗人李东阳为此写了《两太师》一诗，为韩侂胄申诉冤曲，诗曰：“和议是，塞外蒙尘走天子；和议非，军前函首送太师。议和生，议战死，生国仇，死国耻；两太师，竟谁是！”清代学者钱大昕在《过安阳有感韩平原事》四诗中更慨乎其言之。其一云：“十年富贵老平原，一著残棋一局翻，毕竟未忘青盖辱，九京不愧魏公孙。”其二云：“胸无成算擲千钧，壮志区区那得伸？一样北征师淩衄，符离未戮主谋人。”其三云：“忽忽函首议和亲，昭雪何心及老秦。朝局是非堪齿冷，千秋公论在金人。”其四云：“成败论人亦可嗤，谁将秦镜照须眉。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有爱国思想的史达祖，和辛弃疾、陆游一样，对韩侂胄寄予收拾旧山河的希望，怎么能说是“降志辱身”呢？史达祖的友人高观国在《东风第一枝·为梅溪寿》一词中说：“调羹雅意，好赞助清时廊庙。羡韵高只有松筠，共结岁寒难老。”颇能写出史梅溪傲霜寒梅的气骨，一洗后代“其人品流”之诬。清代爱国词人与林则徐一道以鸦片战争而名播宇内、光昭史册的邓廷桢在所写《双砚斋词话》中说：“史帮卿为中书省堂吏，事任胄久。嘉泰间，任胄持恢复之议，邦卿习闻其说，往往托之于词。”又说梅溪词“大抵写怨铜驼，寄怀鼙鼓，非止流连光景，浪作艳语也。”灵犀一点，异代相通，这段话，颇能道出史达祖的心曲。

二 咏怀词和北行词

其实，要谈史达祖的人品，《梅溪词》里的一些咏怀词，早为自己作了准确的写照。如：

《满江红·书怀》：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还也费区区造物，许多心力。未暇买田青颍尾，尚须索米长安陌。有当时黄卷满前头，多惭德。思往事，嗟几剧。怜牛后，怀鸡肋。奈稜稜虎豹，九重关隔。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对黄花常待不吟诗，诗成癖。

这是一首怀才不遇、抑郁不平的咏怀词。上半阙感慨于诗书的无功，以致沉沦下僚，耻同厮养。青衫是官阶很卑的章服。《新唐书·车服志》：“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李商隐《春日寄怀》：“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都是用它发泄官职卑微的不平。词人所感叹的却是，即是区区小官也不是从诗书中得来，它浪费了造化主多少心力啊！这里面有科目困人的不平，有仕途坎坷的辛酸，有栋梁之材不合以为藩落的愤慨。在这样的处境里，既不敢存欧阳修“终当卷箠携枕去，筑室买田青颍尾”（《看枕竹簟》）的奢望，只有像东方朔在“臣朔饥欲死”的呼声中过着“无令但素长安米”的屈辱生活。面对昔日书卷，除了怀惭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下半阙更进一步指出造成个人悲剧的社会原因。南宋王朝一直是投降派掌权，一些有爱国抱负的知识分子，不是遭到排挤，受尽迫害，便是投闲置散，做一个无所作为的小吏。史达祖总结自己的遭遇，牛后般的地位，鸡肋般的生活，完全是一场儿戏。在宋人诗词中，或作儿嬉（苏轼《曹寅甫和李台卿诗，复次其韵》、《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或作儿剧（张榘《芸窗词·贺新郎》），这是多么沉痛的语音。词人进一步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典型的艺术概括：君门九重（宋玉《九辩》），还有虎豹把守，啄害下人（《楚辞·招魂》），是接近不了的。稜稜本是用来形容严冬的霜气，这里用来形容皇帝周围狐群狗党的声势。南宋的最大投降派是皇帝，史达祖把个人的不幸和朝廷力主和议，群小狼狈为奸的现实联系起来。点明悲剧产生的原因。末尾是自怨自艾之词，陶渊

明的归隐生活既不可得，一钱不值的贫贱处境日相煎熬，心情甚恶，本可不必用词来抒写怀抱，其奈写诗成癖，强烈的创作意念难以压抑，终于对那窒息人的时代提出了抗议。

《齐天乐·白发》中也有类似的感慨：“人间公道惟此，叹朱颜也恁，容易堕去。涅不重缙，搔来更短，方悔风流相误。郎潜几缕，渐疏了铜驼，俊游俦侣。”一则慨叹于时光易逝，事业无成。二则慨叹于头白作吏，老于郎署。词人巧妙地运用杜牧《送隐者一绝》：“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及颜驷三世不遇，老于郎署的典故（《文选·思贤赋》李善注引《汉武故事》），说明庞眉郎潜，是和当时好尚乖违的必然结果。这里面能说没有举世和戎、我独策战，“文帝好文，而臣好武”的含意吗？《湘江静》云：“酒易醒，思正苦。想空山桂香悬树。三年梦冷，孤吟意短，屡烟津钟鼓。履齿厌登临，移橙后几番凉雨。潘郎渐老，风流顿减，《闲居》未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词人用“想空山桂香悬树”来表达归隐不得的苦闷，至使天涯倦客，仍自淹留，“梦冷”而曰“三年”，“烟津钟鼓”而曰“屡”，“登临”而曰“厌”，旅途奔波之苦，旧梦难续之恨，无聊生活中抑郁难堪之情，包含的内容已经够深广了，下更接以“移橙后几番凉雨”，更使人唏嘘欲啼。杜甫《遣意》诗云：“细雨更移橙。”又云：“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离群索居，幽处逃名，其中有许多不幸遭遇，许多人事干扰，尽在不言之中，勿怪词人有“潘郎渐老”之感了。潘岳《闲居赋序》云：“自弱冠涉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潘岳深感于拙宦，作《闲居赋》，词人亦深感于拙宦，却归隐不得。这些作品，估计写在受知于韩侂胄之

前，所以反复表达了怀才不遇、与世相违的苦痛心情。当受知于韩之后，词人的思想感情来了一个大的转折。

开禧元年闰八月，李壁出使金国（《金史·交聘表》）。李壁使金是有秘密使命的。《四朝闻见录》乙集《开禧兵端》云：“韩平原欲兴兵而未有间，乃遣张嗣古觐敌，张使还，大拂韩旨。因复遣李壁。壁还，与张异辞，因是阶政府。后又与诛韩之谋。壁使金时曾有诗曰：天连海岱压中州，暖翠浮岚夜不收。如此江山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李壁出使，史达祖随行。

史达祖这次北行，反映在《梅溪词》里的有《水龙吟·陪节欲行，留别社友》、《秋霁》、《齐天乐·中秋宿真定驿》、《鹧鸪天·卫县道中，有怀其人》、《惜黄花·九月七日定兴道中》、《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诸阙。

《水龙吟》是这组词里的第一首。《金史·交聘表》云：“金章宗泰和五年（宋宁宗开禧元年）闰八月辛巳（二十七日，《金史·章宗纪》作“九月甲寅朔”，误。九月朔日为甲申），宋试吏部尚书李壁，广州观察使林仲虎贺天寿节。”此词当作于七月初。南宋的使金路线，据楼钥《北行日录》、范成大《揽轡录》及《石湖诗集》使金绝句等书记载，一般是从临安出发，经吴江、无锡、丹徒、镇江、高邮、盱眙、渡淮水以后车行，经宿州、亳县、宁陵、南京（金改称归德府，今商丘市）入东京城（今开封市），再经滑州、相州（今临漳）、邯郸、邢州、栾城、望都、定兴至燕山，即金中都（今北京市）。由蔚安至中都，一个单程，包括习仪和金人途中接待，大约需要两个多月，所以拟定这首词写于七月初。词一开头：“道人越布单衣，兴高爱好苏门啸。有时也伴，四佳公子，五陵年少。歌里眠香，酒酣喝月，壮怀无挠。”对自己往昔生活作了细致的概括，像东汉陆倕那样“越布单衣”，讲究

衣著，像西晋孙登那样，讲求栖神导气之术，与好客的王孙贵族交游，酒肆歌馆，眼香买醉。生活是浪漫的，乘兴的，有时甚至是无聊的。但放眼半壁河山，想着大好神州，沦于金人，沧桑之感，今昔之感，一齐奔来笔底，“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这是多么强烈的爱国感情。下半阙接着写道：“今日征夫在道，敢辞劳风沙短帽。休吟稷穗，休寻乔木，独怜遗老。”见黍离悲旧京，见乔木思故国，只是一般的家国沦亡之感，曰“休吟”，曰“休寻”，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孟子·梁惠王》篇云：“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只要人心不死，世臣还在，神州的恢复是大有希望的，故曰“独怜遗老”。词人对北方人民寄予了多么深切的希望。

《秋霁》大约是同时的作品，也写于北行之始。上半阙云：“虚阁先凉，古帘空暮，雁程最嫌风力。”下半阙云：“露蛩悲清灯冷屋，翻书愁上鬓毛白。”陈匪石《宋词举》认为“废阁”（当依陆敕先校本作“虚阁”）、“古帘”，“近就所居言之，与下之‘清灯冷屋’，同为驿店邮亭气象。‘雁程’句不专写西风之劲，且为征人远行时之心情。”所言甚是。上半阙又云：“故园信息。爱渠入眼南山碧。念上国。谁是鲙鲈江汉未归客。”陶潜“悠然见南山”的归隐思想，张翰思念吴中鲙鱼鲙的怀乡情绪，都在“念上国”的一念中被排除了。“谁是”是“谁能作”的意思。下半阙在“年少俊游”之后接以“浑断得”，也是“念上国”一念的自我排解。

南宋的积贫积弱，使词人到了金国国境，这一感受就具体化了。《齐天乐·中秋宿真定驿》云：“殊方路永。更分破秋光，尽成悲境。有客踌躇，古庭空自吊孤影。

“闰八月的中秋月是团圆的，但祖国河山，金瓯已缺，面对团圆的夜月，怎么不引起词

人“更分破秋光，尽成悲境”的感受呢？它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词人驿馆徘徊、孤影自吊的爱国者的形象。

《满江红·九月二十一出京怀古》阙，最能代表词人的爱国思想。从这次行程看，九月七日在定兴，九月二十一日在汴梁，都是在贺金天寿节后回程中写的词。京，即北宋旧京汴梁。词云：

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桑梓外，锄耒渐入，柳坊花陌。双阙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鸯翼。更无人摩笛傍宫墙，苔花碧。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

用孟轲“予三宿而后出昼，于余心犹以为速”（《孟子·公孙丑》下）抒写在秋风中缓辔而行不忍仓卒离去旧京的复杂感情，给人以迷离怅惘的情绪感染。下面正面描绘徘徊近郊远望高大宏丽但却沦陷了的汴京：宫观双阙，留下了龙楼凤阁的影子，旧宫九门，门户成双成对像鸳鸯翼般紧紧锁着，引起了元稹《连昌宫词》所记“李谟摩笛傍宫墙”的感喟，就是必然的了。若果说元稹用李谟故事抒发的是盛衰之感，那么，词人在“摩笛”之上着以“更无人”，在句下更以“苔花碧”的凄凉景色铺垫，所抒发的则完全是半壁河山之痛了。

“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民离德”，是有具体内容的，与《宋史·辛弃疾传》弃疾由绍兴被召廷对时所说“金国必乱必亡，愿望之元老大臣，务为仓猝应变之计”的看法是一致的。《齐东野语》卷十一《邓友龙开边》云：“时金人方困于兵，且其国岁荐饥，于是沿边不逞之徒，号为‘跳河子’者，时时剽猎事状，陈说利害。友龙得之，为奇货，献于韩。”又卷三《诛韩始末》云：“时金虏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金太祖完颜旻）、吴乞买（金太宗完颜晟）之比，丙寅（开禧二年）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复能

出师，其弱可知矣。”形势就是如此，金邦已弱，遗民思宋。所以词人认为义旗一举，以高屋建瓴之势，收复河山，指日可待。词人不无愤慨地说：自身岂乏治世之术，只是不预平戎之策。这里有政治才能的自负，有卑贱地位的自卑，有沉沦下僚的不平，百无聊赖，惟有用诗词来襄赞成功，讴歌升平了。韩元吉叙述南宋出使金邦的人，一般是“率畏风埃，避嫌疑，紧闭车内，一语不敢接”（《南涧甲乙集》卷十六《书朔行日记后》），可是随李壁使金的史达祖，却能完成“觐国”的使命，在了解金人虚实之后，写出这样充满爱国激情的词作。高观国《齐天乐·中秋夜怀梅溪》云：“孤光天地共影，浩歌谁与舞，凄凉风味。古驿烟寒，幽垣梦冷，应念秦楼十二。归心对此。想斗插天南，雁横辽水。试问姮娥，有愁能为寄？”《八归·重阳前二日怀梅溪》云：“关河迥隔新愁外，遥怜倦客音尘，未见征鸿。雨帽风巾归梦杳，想吟思吹入飞蓬。料恨满幽苑离宫，正愁黯文通。”挚友的寄语，有助于了解梅溪北行词的思想。

三 咏物词

张炎《词源·咏物》举史达祖《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绮罗香·咏春雨》和《双双燕·咏燕》后说：“此皆全章精粹，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咏物词更是《梅溪词》中表达爱国激情的力作。试以《双双燕·咏燕》为例，词云：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棲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玉人，日日画栏独凭。

词的上半阙写双燕寻巢情景：社日刚过，双燕归来，在落满尘埃的旧日帘幕前，徘徊不定，软语商量，然后决心出幕，另寻香巢。词的下半阙，写双燕定巢情景：衔泥

定巢，踌躇满志，游荡在花柳之间，留恋到黄昏曛色。词人笔锋一转，对双燕进行谴责：朝欢暮乐，忘记了寄书的职责，致使闺中玉人，念远生愁。前引邓廷桢《双砚斋词话》在谈到史达祖习闻韩任胄恢复的议论，往往把家国之感托之于词一段话后，就举了这首《双双燕》与《瑞鹤仙》“归鞭隐隐，便不念芳盟未稳”，《金缕曲》“落日年年官树绿，堕新声玉笛西风劲”与《玉胡蝶》

“故园晚强留诗酒，新雁远不致寒暄”（此词亦见《梦窗乙稿》，冯煦《蒿庵论词》谓语意似与邦卿为近）作证，说明写的是铜驼荆棘的感慨。陈匪石《宋词举》更说：“如以寄托言，则红楼归晚以下六句，讥其不思恢复宴安酖毒之非，喻中原父老望眼欲穿之苦。曰看足，曰应自，曰便忘了，曰愁损，曰独凭，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居然《春秋》之笔。”这类讽刺南宋小朝廷宴安酖毒的题材在诗篇中是数见不鲜的。如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其一云：“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林升《题临安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都写得很显露。这首咏物词却将对国事的忧虑和对统治者的谴责蕴含在双燕寻巢定巢这一艺术形象之中。沈祥龙《论词随笔》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这首词不用一般的情事两显的手法，却以华美的具体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索余地和美的艺术享受。

再以《绮罗香·咏春雨》为例，词云：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它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沈沈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词的上半阙由将雨写到下雨，写到蝶燕

无迹，误尽淑偶佳期。既是为雨而愁，也是因雨生怨。下半阙转入怀人，望见雨中冥迷的山，联想到伊人的眉妆。遥想今后，雨后新涨的江水，带愁飘零的落花；回忆当初，雨打梨花与伊人闭门夜话的情景：从对雨生情之中，寓怨而不怒之旨。这首细腻描绘春雨的词却有着刺时的内容。耽误淑偶佳期妨碍钿车到来的是春雨；引起春潮晚急以致津渡难寻的也是春雨；远山含泪引起谢娘眉妩联想的还是春雨。但雨水却浸淫渐渍，连绵不已。黄蓼园《蓼园词选》说是写的“小人情态”，已经把这首词看作政治讽刺诗了。它和《东风第一枝·咏春雪》有着相似之处。词人抱怨春雪，一则说，“东风欲障新暖”，二则说，“不卷重帘，误了乍来双燕”，又是“障”，又是“误”，怨恨的感情溢于笔墨之外。而这些哀怨又是从“旧游忆著山阴，厚盟遂妨上苑”产生的。王子猷雪中咏左思《招隐诗》离开山阴访戴安道的雅兴，邹阳、枚乘、司马相如雪中随梁王相约游于菟园的寒盟，从过去想到现在，是谁在起“妨”的作用呢？过去留下的美好的回忆，今天却成了损害，难道这不是或和或战，国策举棋不定的形象再现么？我们谈南宋的爱国词人应该给史达祖以一席之地。

四 艺术成就

《梅溪词》的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词风的多变，咏物词的钻貌取神，句法的千锤百炼，三者尤为突出。

梅溪的词风，正如张镃说的，“有瑰奇惊迈清新闲婉之长”。“清新闲婉”，亦即姜夔所谓“奇秀清逸”。它的表现是，用典浑成，托意深婉，用笔起伏顿挫，回环曲折，上下关合在若断若续若即若离之间，但却构成了一幅完整生动的画面，形象鲜明，意境清新，神气空灵。这是梅溪词风的一个方面，是梅溪的本色。另一方面，“瑰奇惊迈”

之作也不少。前面举到的《满江红》“万水归阴”一阙，“好领青衫”一阙，“缓辔西风”一阙放在《稼轩长短句》中，不仅拳拳忠爱的内容相近，而且深于用事，精于构思，炽烈的感情，豪迈的气魄，慷慨沈郁的语言，也极为相似。其它如《临江仙》的“倦客如今老矣，旧时不奈春何”一阙，《贺新郎》的“同住西山下，是天地中间爱酒能诗之社”一阙，“西子相思切，委萧萧风裳水佩照人清越”一阙，《齐天乐》的“秋风早入潘郎鬓，斑斑遽惊如许”一阙，也都以豪迈词风见长。

梅溪词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咏物词的刻画物态，穷形尽相，借物寓情，神与境合。张炎曾论之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这是深得咏物神髓的甘苦之谈。所谓“体认稍真”，即一味追求外貌的形似，捕捉到的只是外在的形象，即使维妙维肖，如宋人之刻楮叶，虽茎柯豪芒，可以乱真，但缺乏生香活色，不能感人，所以说“拘而不畅”。所谓“模写差远”，即离开精细准确的描绘去追求所咏之物的神韵和气质，在牝牡骊黄之外用工夫。这样做的结果，作家的创作意向虽然表达出来，但读者却不能把作家抽象的概念变成可感的形象，所以说“晦而不明”。被张炎誉为“全章精粹”的梅溪咏物词却没有这两方面的局限，而能钻貌取神，在形似的基础上追求神似，如张炎所说，“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引姜夔最为称赏《绮罗香》“临断岸”以下数语，又引姜夔极称《双双燕》的“柳昏花暝”。黄升也说咏燕这首词是“形容尽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索的。如描写春雨之将临，只“做冷欺花”三句已描绘出春雨酝酿过程：春寒酿成春雨，花受到欺凌，柳困在烟雾之中不能舒展，暗暗地催促着暮春的到来。起首三句便把作者受到压抑的精神境界若隐若显地传达出来了。

“临断岸”一结，雨后江涨，落花飘零，春雨带来了今后更为痛苦的生涯。未来是身临断岸，落花带愁；当初则雨打梨花，闭门共话。一喜一愁，一聚一散，两两对照，只增感喟，词人的自叹身世也就蕴藏在这情景交融的结尾里了。黄蓼园称许是：“自有身分，怨而不怒。”又如咏燕词的上半阙，呢喃双燕的形象只“软语商量”四字已经形容尽致了，接着却笔酣墨饱地描绘燕子的翩翩身影轻掠花梢，双双翠尾分开花丛，形象的具体生动简直到了传神的地步。“柳昏花暝”而曰“看足”，双燕沈醉在花柳之中志得意满的神态可以想见。娇痴的双燕形象与词人谴责燕子的曲折用心便水乳交融在一起了。词人对双燕的描绘既善用绮丽华艳的词藻，又善用轻描淡写的语言，或用浓墨渲染（宋征璧谓“史邦卿之刷色”，即就渲染而言，见田同之《西圃词说》），或用淡墨白描，使“雕梁藻井”的设色，与“软语商量”的白描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手法，也是令人惊服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云：“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离开了思想内容，即陈廷焯所说的“性情”，是无法理解梅溪咏物词的艺术技巧的。

为陆辅之《词旨》所盛称的句法，是梅溪词的另一成就。句法与语言文字的锤炼有关。《诗人玉屑》卷八引唐诗人皮日休说：“百炼为字，千炼为句。”张炎《词源》也说：“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这就是说，句法是通过清浊抑扬敲打得响的音律和自然、独到、深刻、精工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词旨》在“属对”、“警句”、“词眼”中多引梅溪词句。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中有《史

梅溪摘句图》，称：“史达祖《梅溪词》最为白石奇赏，炼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独《双双燕》一阙也。余读其全集，爱不释手，间书佳句，汇为摘句图。”分起句、尾句、散句三部分摘录，可以说是洋洋大观了。今就其中二例，作一简析。《秋霁》的“但可怜处，无奈冉冉魂惊，采香南浦，剪梅烟驿。”用浸渐的惊魂描写九回的衷肠，是虚写。《九歌·河伯》云：“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陆凯诗云：“折梅送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此诗见周邦彦《片玉集》卷二陈元龙注引《荆州记》，言陆凯赠范焯诗。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云：“诗家以为晋人，非宋文时范焯，姑从其说”）。“采香南浦”，是折花送别；“剪梅烟驿”，是折花寄远。虚写的感情附丽在实写的故实上，词人在惊魂所系全在旧情这一难于传达的意念就巧妙地传达出来了。这一结尾之妙，妙在虚实相生，寓深情于典实。又如《三姝媚》的“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委婉曲折地刻画了一位多情妇女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的女人，却在别人面前讳莫如深地掩盖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罗裙，却突然发现腰围减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难于掩抑的动作，有起伏的感情，有跳动的画面。这样复杂的内容却凝聚在短短十二字中，既经济，又含蓄，艺术概括力之高达到了极境。

就是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爱国词人，前代评论家对他的词大都欣赏他的艺术技巧却惋惜他的为人，缺乏全面地、深入地、实事求是的分析。解放以后，有的选本如胡云翼《宋词选》，甚至说，“缺乏意境和气骨，尤其是他的致命伤。”“除了描写技巧以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了。”“玩弄文字游戏，缺乏真情实感。”针对这些情况，用确凿的材料，发潜德之幽光，正是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职责。